

#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簡史

三

#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簡史

蘇聯人・伯伯大著

孫亞明譯

新知書店出版

#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簡史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著者 藤田K・伯伯夫

譯者 孫亞明

出版者 新知書店

桂林桂西路卅九號

發行者 各地新知書店

重慶・貴陽・昆明・衡陽  
上海・香港・辰谿・金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目 錄

### 一、一般的特徵

### 二、幾個基本階段的特徵

- 1, 從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三年——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
- 2, 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五年——日本加入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鬥爭
- 3, 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三年——日本的工業化及殖民地的掠奪
- 4,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日本軍備的加強及其侵略的積極化
- 5,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戰後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經濟危機
- 6,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與日本底軍事通貨膨脹的情況

## 一、一般的特徵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一個註解裏，關於封建日本的經濟特徵，曾經這樣寫過：

「日本伴著極的純封建底土地私有的組織，和她的廣汎發達底小農經濟，比起我們那些含有多量資產階級偏見的歷史書籍，還要更多而更正確地給予我們以歐洲中世紀的情景。」

日本踏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路上，較其他各國爲遲；這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末期。當時在日本已明顯呈現出封建制度的衰落，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諸必要前提（商品生產，勞動力的自由雇用，相當程度的資本積蓄）在封建制度內部成熟着的過程。

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在所謂「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的前夜，日本還是個封建的農業國家。幕府和諸候政府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五是來自農村經濟；祇有僅少的百分之十五，才是得自手工業、幼稚的作坊及商業。人口的大部分都在鄉村，城市裏總計才有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民。可是，在這同時

，日本經濟中社會的分工和交換關係的發達，却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日本的封建王侯已逐漸失掉其閉關自守的性質，他們不祇爲着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並且還爲着拿到市場去販賣而生產了。有些諸侯會保護棉業及絲業，保護棉織物及絲織物的生產。個別的区域，特別是這些城市，如京都、西陣、桐生、足利、福井、奈良、岐阜，均以生產各種紡織物聞名於世。至於陶業和漆類顏料業，其情形也是相同。例如瀬戶（位於名古屋附近）是現今日本最大陶器生產的中心地之一；牠遠在一二三〇年便開始製造陶器，並且很早就以藝術的茶具蜚聲中外。著名的「有田」（在九州北部），那裏的磁器生產是始自一九五〇年。

若干採礦業的部門，當時在日本也發達起來。例如在九州，從很早就用手掘方法採煤；三池礦坑的煤，由一四六八年便開始採掘。在本洲島的西南部，更曾採集鐵砂。日本曾是世界上產銅最富的國家之一。而同時，日本金屬製品的鑄造，也頗形繁盛。比如：著名的「日本刀」是在鎌倉、京都、大阪、酒井、各地傳造的，住友的老閭曾在酒井煉銅（該製銅工廠是一五九〇年設立的。牠會從葡萄牙人的手中，購得了由銅及鉛提煉出銀的特許權）。那時日本的煉銅地方已有數十處。在十七世紀，特別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荷蘭及中國的商人會把日本銅運往外國銷售。

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家庭內的資本主義底勞動和作坊，已在日本開始勃興。

日本許多大規模的市場，漸次在形成着。大城市的數目雖然寥寥無幾，但其中有幾處如大阪、京都，却已能够起着很大的作用了！

日本的歷史家本莊榮次郎把德川時代的大阪叫做「富翁城」。「全國的廚房」。當時的人們常常這樣說：一切日本封建主的悲歡，都是由大阪的米市場底情況來決定的。

日本的封建主曾與購買其領地內生產品之各種商人和中間人，有過密切的聯繫；當時甚至有些人專門從事販賣這些生產品的事業。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裏，在大阪、江戶（東京的舊名——譯者）京都、名古屋、大津，都存在過米的交易所。在大阪會廣汎地發展着植物油，尤其是醬油的買賣（醬油也時常用做液體燃料）。魚類市場及蔬菜市場，也在大城市裏形成起來。桐生當時曾是個大規模的絲市場。每逢節期，各地就常常有大的定期市場之開設。例如仙台是賣馬的定期市場；大阪是牛羊的定期市場等。同時，各種「行會」也曾存在。在江戶有過包括十個批發店的行會；在大阪有過包括二十四個批發店的行會，誰都知道，這些行會中的一個「十商同盟」，每年會繳納日金一萬圓以上的特許稅！

最初研究日本的歐人之一傑姆費爾，曾這樣描寫十八世紀末葉的京都：「京都是整個日本工業生產

品的大倉庫，是日本主要的商業都市，在這個都市裏，幾乎沒有一家不從事生產或販賣。這裏煉銅、鑄幣、印刷書籍、紡織帶有金銀色的高價紡織物。上等的稀有顏料；精緻的美術雕刻物；各式各樣的樂器；圖畫；刷漆的保險貴重物品底小箱；各種金製品及其他金屬製品；特別是銅製品（例如硬鋼製的刀劍以及其他武器）；極貴重的衣服：——這一切一切，都以非常驚人的成績，在這裏生產着。」

在民族市場形成過程的同一時期，另一個過程也在演進着：這就是：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侵入農村。農民和封建主開始一天一天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捲入了新的商品貨幣關係底制度之中。在這種情形下，農村中的階級分化過程，遂因之也廣泛地產生了。

當時，生產力的繼續發展，顯然是被站在統治地位的封建農奴制度所阻礙；而這個制度的代表者，便是倚賴於封建主和官僚警察機關的將軍幕府。

反對那時被將軍及其反動夥伴所支持的封建關係，在農民當中，在商業資產階級、幼稚的工業資產階級、一部份武士及與商業資本有聯繫的若干封建貴族階層當中，都掀起了騷動。

如同上面說過的，封建日本的基本民衆，是個租封建主土地的農民。在封建時代，日本農民的狀況非常困頓：他們的生活是被當局的特別法令限制得無微不至。幕府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藉此更積極



地來榨取農民所擁有的一切資產並加緊地來榨取他們。

爲增加商品生產，封建主曾千方百計加強其對農民的剝削，中世紀時代，在日本流行過這樣的話：

「農民好似胡兀子；越榨油越多。」

諸侯和武士與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相結合而引起底對於金錢之需要，更使得農民趨向破產與貧困；大衆的飢餓和死亡，不僅蔓延到許多家庭，而且還波及到千百村莊，在德川時代（註一），從一六九〇年至一八四〇年，在日本曾有過二十二個飢荒年頭。

因此，從老早就開始的被壓迫農民之反抗封建農奴剝削底鬥爭，遂一天天擴大起來。

日本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倉正，在其所著「農民暴動的研究」一書中，曾謂德川時代總計發生暴動五百七十起（註二）這些暴動把農民運動的發展情形，是如此明顯地表示出來：

從一六〇三年到一七〇三年曾發生暴動八十起，每年平均爲〇・八次。

從一七〇四年到一八〇三年曾發生暴動二百五十四起，每年平均爲二・五次。

從一八〇四年到一八六八年曾發生暴動二百三十六起，每年平均爲三・六次。

如吳祇拿十九世紀來說，則前半期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五三年共發生暴動一百七十八起，而後半期

僅在十四年裏便發生了五十八起。

有些暴動曾帶有長期的性質，甚至延續數十年（例如一七一六年至一七三六年的暴動以及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四年的暴動），擴大到非常廣泛的限度。有的時候，暴動的參加者竟達二十萬左右的農民，一七五四年久留米的暴動；賓下地方（兵庫縣）的暴動；秩父及熊谷各地方的暴動；便都是這樣的情形。同時，在這些暴動當中，更隨伴着破壞封建采地和佔領城市的事情；這裏的主要參加者爲佃戶與小農。爲了鎮壓暴動，封建主常常費去幾個月工夫，並動員全部軍隊。例如在有名的一六三七年底島原暴動時，二萬七千以上的農民固守看廣城要塞，曾與封建主的二十萬大軍對抗了五個月之久。這裏，特別當提出的就是：從一五八八年，將軍幕府便禁止「平民」持有武器了。

爲着米，爲着土地，爲着減低或廢除各種苛捐雜稅，爲着爭取農產物向市場販賣的自由，農民不斷進行了鬥爭。他們屢次起來反對各種限制和封建的束縛，反對封建主與高利貸制度。嚴重被盤剝的農民，曾經是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一支生力軍！

拋棄鄉村而湧入城市的無土地農民，和城市的貧民一樣，由於米價的昂貴，不住在遭殃。以致，因此而惹起的城市住民的騷動，便更加强了農民暴動的力量。

本莊榮次郎在『日本社會史』一書中，曾舉出實例謂由於投機價格的增漲結果，在江戶發生過一次最大的暴動。在豐年的時候，大米每百袋可值十七至十八兩（一兩差不多等於從前的日金一圓；那時的日金一圓可當現在的日金兩圓以上）。而一七八七年春季，同樣數量的米，竟飛漲到一百八十兩之多；五月初更達至二百一十八兩。終于，五月十八日爆發了空前未有的大暴動。同樣的事情，也就是日人所說的『米騒動』，從十七世紀初就越發頻繁起來。

對於現存制度的不滿，當時不僅播遍被壓迫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當中，而且也波及到統治階級的內部。德川時代的主要力量——武士或軍人貴族，在封建主衰頹的影響下（封建主有時已認為養養武士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利益了），已開始崩潰起來。武士逃走的事情，也層出不窮；並且在這些武士當中，更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名叫『浪人』的不屬於任何封建主的武士。一部分不滿將軍幕府的武士漸次廣泛地唱出反對將軍的口號，主張恢復天皇的權力。

還有，日益興商業高利貸的活動合流起來的一些封建主，對於現存制度也懷着敵對的態度。甚至這些大封建主曾企圖利用反對將軍的運動，竊取國家政權，以恢復他們那失掉已久底特權。換句話說，某些大封建主曾圖謀佔據將軍的位置。

新興商業資本階級，也是當時反對反動的統治上層底一員。在德川時代，曾有過像近池這樣的富翁，他是七個氏族的「掛屋」（一種金融代辦人）三井在當時也大肆展開了商業活動；這活動的起始，是早在一六八八年三井在江戶創辦小錢莊的時候。此外，鉅商住友及淀谷（德川時代的末期破產倒閉），在當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商業資產階級（其中一部更開始轉變為工業資產階級），牠曾經非常激烈地反對着封建制度。國家的四分五裂；人民移動的大受限制，關稅的奇重（這種關稅幾乎每個封建主都於商品通過其領地時徵課的）；由於每個封建主都有造幣權而產生的金融制度的大混亂等等——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與新經濟條件不相一致的情形。日本生產力的發展，「與當時存在着的歷史傳統下來並且已經確立了的生產方法，起了勢不兩立的矛盾；也就是與封建制度所特有的並且專為壓迫無特權階層底同業行會及其他無數個人的和地方的特權，起了勢不兩立的矛盾」（費爾巴哈論）

對於商業資產階級，建立中央集權的問題獲得了首要的意義。例如商業資產階級的最大代表三井、住友、近池，他們曾不斷資助帶有反幕府色彩極濃的各團體，特別資助了企圖顛覆當時存在着的將軍制度底那班封建上層。這些封建上層在明治維新將要到來之前，曾由日本商業資產階級拿到鉅額的借款。

日本反封建裡格的內部鬥爭，是在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爲着掠奪殖民地而瘋狂向亞洲深入底國際鬥爭環境中進行着的。當時，日本也是這些國家的侵略對象之一，一八五八年美國軍艦曾在別里將軍指揮下，最初駛入日本沿海，企圖佔領這些小島。後來，帝俄軍艦也會做過同樣的舉動。但畢竟因爲當時所造成的國際環境的困難和日本工業的迅速發展，致使外人欲變日本爲殖民地的企圖，未能實現。不過，這些外在的因素，在封建制度崩潰過程中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還加速了日本的走向資本主義路上。

列甫當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曾着重指出它是比其他各國都來得特別猛烈些的這一點；而且更根據日本的實例，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法則。「現在，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年青的以驚人速度前進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另一方面，我們又可看到舊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進步，近來是比前一些國家慢得多了（法國及英國），（列甫全集第十九卷）「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的增強比英國及法國快了三四倍；日本則比俄國快了十倍。」（列甫全集第十八卷）。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具有下述諸特點的：

（一）一八六八年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和混血性。

關於這個問題，庫西甯同志曾這樣說過：『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距完成甚遠，她是非常不果決而又不澈底的。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祇有從這時候，我們才能談到日本資產階級的改革以及含有資產階級革命意味的種種變動——從這時起，發展一向就是循着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大地主間底妥協路途前進的，這些妥協，從來就是以犧牲工人和農民來實現的。在其他各國，在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縱然也不澈底，但却深刻多了。在那裏，對於堅實的獨立農民底發展，曾造成許多很大的可能性。然而在日本，由於封建制度强有力的殘餘之存在，這些可能性便完全消失了。日本所具有的這些特殊因素，既使其國內市場因而狹窄起來，而同時，這種情形的本身，又顯然滯礙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牠的轉變為澈底的簇新現代的金融資本主義。』（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庫西甯同志的報告）。

登台而掌握政權的封建主與資產階級同盟，並未肅清封建制度的臨絆。相反，牠利用了這種臨絆，在農村，特別是在城市裏，最大限度地榨取着勞苦大眾。同時，封建主與資產階級同盟既關心資本主義的發展，於是經過許多的改革，遂推動日本走向了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路上。

前資本主義份子與資本主義份子聯合的結果，使得日本獲取了勞動力的異常低廉。這種情形，造成

使日本能與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的局面。最著名的日本財政家之一，曾歷任大藏大臣而於一九三六年法西斯政變的『二二六事件』中犧牲了的高橋是清，他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年頭裏，曾率直說過：『如果列強資本主義國家握有黃金，那麼對於日本，廉價的勞動力便是黃金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特點，也就正蘊藏在前進資本主義份子與封建殘餘的這種結合之中。在日本，這和在帝俄一樣，『最新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可以說是被前資本主義諸關係之非常緻密的網纏繞着的。』（列甯全集第十九卷）『在日本和俄國，武力的、廣漠領土的、或掠劫異族、掠劫中國等特別方便的獨佔，一部分是補充、一部分又是代替着現代最新的金融資本底獨佔。』（同第十九卷）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標識，便是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戰；一九三一年的佔領滿洲和一九三五年的侵佔華北。

日本帝國主義是在軍事的警察反動底環境中，和國內封建殘餘存在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因之，由此產生了日本當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而同時，高度發展的日本金融資本的集中，又保證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能急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



(二)軍人在國家起着很大的作用。

軍人，尤其是長洲（今本洲南部山口縣區域）族和薩摩（九州鹿兒島縣區域）族的軍人，他們曾經是反將軍門爭中的最積極的份子，這些軍人在國家中佔據了領導和獨立的地位，實際上操縱着國家的機關；並創設元老院和樞密院，以通過牠們，來監督整個國家的生活。

正和認為國內改革是具有首要意義的那些自由主義歐洲型底明治時代的日本大政客（大隈、板垣、加藤等）相反，以天皇的親信和有力的元老山縣有朋將軍爲首的執政底「軍人政黨」，牠却提出了另外一個口號：「先防外敵以保身，然後再談國內的改革。」

山縣有朋，這個俾斯麥和摩里開的德國教條底保持者及威廉二世的拜倒者，他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到歐戰終結，在日本幾乎僭取了五四十年間的政權。在這一整個時期裏，內閣首相和其他重要職位，從來就是由山縣自己，或由其擁護者如黑田、勝浦、寺內、樺山、東鄉、乃木等大將所據有的。

山縣是日本軍隊的組織者之一；他創制了陸海軍歸天皇直接統帥的法律；他是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體現者，是「突擊」戰術的擁護者。

根據山縣的命令，一八九四年當年青的東鄉還祇是海軍大尉而任艦長的時候，爲了「將事變加速——



法國歷史家瑪振爾這樣寫着（他是一九一〇年巴黎出版的「日本歷史和文明」的作者）——遂擊沉載運中國軍隊的英國商船。」

其後又經過不到小小十年，一躍而為海軍大將的東鄉，又依照山縣的命令，開始了日俄戰爭。關於此層，瑪振爾寫道：「山縣非常洞悉，如果在一八九四年身為一個普通艦長的東鄉，敢於違反政府命令而以掀起戰爭為己任，那麼現在已經是海軍大將的東鄉，當然要更積極出以同樣的舉動了。」

在滿洲及中國本部，努力實行其固有政策的現代日本軍閥，目下是正在促進山縣有朋的「偉業」之復活，並在新的條件下，重複着山縣所酷愛的口號：「日本的整個力量，正在於其軍事威力之中。」

（三）「掠劫異族、掠劫中國等特別方便」的這一件事，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日本所進行的一切戰爭（如同上面已經說過的）以及各種各樣的軍隊出征，一向就是或多或少地與中國有關連。「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爲了剷除生產力發展一方面與資本積蓄、另一方面與殖民地及金融資本的「勢力範圍」底分割之間的不一致，除了戰爭以外，還能够有別的方法麼？」（列甯全集第十九卷）